



自序

這是一本有關猶大人在被擄與流散的過程中尋索自身身份的書。

猶大人被擄到巴比倫，受着文化的挑戰與信仰的衝擊。他們被迫面對政權、偶像和身份的問題。這些挑戰激發他們從信仰根源尋覓其身份價值與踐行信仰的力量，使其在高壓及不友善的環境中保存自己的核心信仰。誠然，在古近東出土的泥版，以及其他在聖經以外的考古資料，都能幫助我們重構猶大人在主前 586 年至主前 538 年期間在巴比倫的生活，了解他們的信仰如何受巴比倫神明及神話的意識形態衝擊，並讓我們明白這些衝擊如何迫使他們回歸信仰之根本，

尋索耶和華信仰的核心信念，及倚靠這種信念來面對他們多變的環境。本書嘗試以不同的經外文獻重構巴比倫的世界，教我們更深入了解流散在巴比倫各處的猶大人的學習狀況，以及其經濟、商業與宗教方面的活動，從而讓我們加深認識整個被擄流散之處境。

為了回應被擄之猶大人身份認同的問題，舊約聖經不同的作者以多個進路來論述猶大人的身份，有些作者以繼續定居異鄉的角度來探討身份（例如：但以理），有些作者卻鼓勵被擄的猶大社群回歸耶路撒冷尋根（例如：以斯拉與尼希米）。無論去或留，猶太信仰對他們而言也顯得十分重要，成為他們尋索自身身份的寶貴資源。本書主要論述舊約聖經中的五卷書卷：

1. 第二以賽亞大約於主前 550 年呼籲被擄的猶大人

回歸迦南地，離開將要倒下的巴比倫，並透過回歸的旅程來尋索其原初的身份。

2. 選擇流散的但以理堅定地持守他的一神信仰，在跪拜君王的外邦異文化當中，以及在強權的同化下，但以理與他的友人相信耶和華掌管着萬有與歷史。他們以此確立他們的身份。
3. 所羅巴伯、以斯拉與尼希米選擇帶領以色列人回歸耶路撒冷重建聖殿。他們在第一聖殿的原址重建，致力延續摩西與大衛的信仰，以第二聖殿來建立群體的身份認同。
4. 《詩篇》的作者在編輯詩篇集時，回應了因被擄事件而帶來的「大衛之約」失效問題，說明在動盪與流散的大時代中，耶和華在全地作王之信仰能夠讓被擄流散者建立其身份。

5. 以西結身處被擄的大時代，他在巴比倫看見異象及召命，傳揚盡心牧養迷羊的信念與使命，以守望者的召命來建立自身之身份認同。

這樣看來，不同的聖經作者以迥異的進路，在被擄與流散的處境中反思身份認同的課題。無論上帝的子民選擇留在巴比倫，抑或決意回歸耶路撒冷，信仰對他們而言都是重要及真實的。召命沒有因為時代及環境的改變而喪失，反而在動盪的環境中，召命顯得更為真實。

無論去或留，信仰都是真實的。上帝是全地的主，無論在哪裏，祂都在！

感謝明風出版願意出版此書，從構思到出版，我們都有很多互動，彼此有美好的合作。感謝出版社提供優質的編輯，並為此書起了一個美麗的名字。本書

基本上是在新渡輪的輪船上完成，每天接載我來回長洲與中環的輪船成了我思考及寫作的「聖地」，感謝上帝賜予這珍貴的空間。

高銘謙

寫於長洲
2023年4月12日



從主前 597 年開始，猶大人被擄至巴比倫，展開了他們流散的生活。到底這個流散到巴比倫的世代是一個怎樣的世代？到底他們流散到巴比倫的幾十年是怎樣生活的？他們如何面對外來環境對其身份的影響與衝擊？猶大人流散到巴比倫是一件歷史事件，我們只能藉着聖經或其他歷史文獻來重構當時的處境。當我們更全面了解巴比倫帝國的面貌後，才能更立體地了解之後數章的內容：第二以賽亞、但以理、以斯拉、尼希米、所羅巴伯、某詩篇作者及以西結在被擄到巴比倫的場景下，就以色列人尋索其身份所發出的信息及所給予的鼓勵。

筆者期望在本章透過以下四個層面，帶領讀者進入巴比倫的世界：

1. 定義「被擄」及「流散」；
2. 探討被擄的以色列人在巴比倫的生活——貴族階層；
3. 探討被擄的以色列人在巴比倫的生活——平民階層；

4. 描述繁華的巴比倫城的情況。

甚麼是被擄與流散？

以色列人如何理解在那個世代所發生的事？誠然，不少聖經學者投放了大量精力去研究被擄與流散的世代，嘗試以更精準的文字來描述猶大人被遷到巴比倫的經歷。有一些學者建議完全棄用「被擄」(exile)這用詞來描述主前 597 至 538 年所發生的事，這是因為「被擄」含有濃烈的神學含義，並不能夠客觀地報告歷史的走向，¹ 他們傾向用「遷徙」(migration)或「移民」(immigration) 等較中性的詞語。然而，這樣把歷史與神學分家，無助我們理解以色列人的第一身經歷。「被擄」這字眼不但是舊約的詞語，更深深並

1 關於這方面的討論，可參 Lester L. Grabbe, ed., *Leading Captivity Captive: "The Exile" as History and Ideology*, JSOTSup 278 (Sheffield: Sheffield Academic Press, 1998)；同時也可參 Ehud Ben Zvi and Christoph Levin, eds., *The Concept of Exile in Ancient Israel and Its Historical Contexts*, BZAW 404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2010)。

有系統地植入以色列人對這段歷史的描述當中。「被擄」，不只是歷史事件，也是一種神學立場，更是一個深刻的經驗。

「流散」(diaspora, διασπορά) 一詞由「穿越」(διά) 及「分散」(σπείρω) 所組成，形容那些有相同民族認同感的人，因為戰亂或其他因素而散居及流離在世界不同的角落。自從猶大人經歷被擄之後（主前 597–538 年），有部分猶大人按照波斯帝國第一任帝王塞魯士（也譯作古列，Cyrus the Great）的詔書所吩咐（代下三十六 22 ~ 23），回歸耶路撒冷重建聖殿，也有一些猶大人選擇留在巴比倫及美索不達米亞一帶。此外，亦有一些猶大人散居在埃及尼羅河流域一帶。這反映着一種普遍的流散現象。我們可以在哈曼向亞哈隨魯王所說的話中找到這樣的描述：有一種民，散居在王國各省的民中（斯三 8），當中散居這詞由兩個原文所組成，它們是「被分散的」(מִפְזָר) 及「被分開的」(מִפְרָך)。兩個詞都是被動式，說明猶大人無奈地被分散與分開，經文卻同時用「一個民族」(עַם־אֶחָד)

來形容他們，正正說明這些分散的猶大人有相同的民族認同感，就算哈曼這位外邦人也能看出來。誠然，無論猶大人散居在何地，他們都已經不是一個主權國家之下的人民，他們的民族身份不能以一個主權國家的國民來定義，以致他們在流散的過程中，要藉着另一些重要元素來建構他們的身份認同。他們在流散期間常問一個重要的問題：怎樣才是一個真正的猶大人？既然猶大人的身份不能以一個主權國家的國民身份來定義，那麼他們便要以另一種方式來尋索身份。流散的世代與被擄的經驗，激化了這種對身份的尋索。

或許，我們可以從舊約中那些在被擄回歸時期成書的不同書卷，來分析猶大人如何在流散與被擄的時代建立他們的身份。這個進路有其理由。事實上，學術界多年來都認定，被擄與流散的時代是孕育希伯來聖經文獻的重要時期，被擄事件造就了猶大人進深的神學反思，他們因為這段悲痛的歷史而體會到上帝的啟示與心意，帶來神學思想的演進，使被擄的主題成

為舊約成書的中心神學主題。卡爾(David M. Carr)這樣說：「希伯來聖經是為被擄而寫的聖經，雖然它保存了不少大概是被擄前的傳統，也包含了被擄後的其他傳統，但聖經整個文集都導向被擄的經歷。」²本－茲維(Ehud Ben Zvi)這樣說：「希伯來聖經和我們所認識的大部分書卷，都不可能在一個缺乏被擄這個中心概念的社會，或為一個缺乏被擄這個中心概念的社會而寫成。」³另外，艾克羅伊德(Peter R. Ackroyd)認為，被擄與流散乃是孕育大部分舊約書卷的場景，他指出：

-
- 2 "The Hebrew Bible is a 'Bible for exiles.' Though it contains traditions that probably pre-dated the exile, along with other traditions that long post-date it, the collection as a whole is oriented toward the experience of the exile." David M. Carr, *The Formation of the Hebrew Bible: A New Reconstruc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226.
- 3 "Neither the Hebrew Bible nor most of its books as we know them could have been written in or for a society that lacked the mentioned, central concept of the exile." Ehud Ben Zvi, "What Is New in Yehud? Some Considerations," in *Yahwism after the Exile: Perspectives on Israelite Religion in the Persian Era*, ed. Rainer Albertz and Bob Becking, STAR 5 (Assen: Royal Van Gorcum, 2003), 37.

但在這一時期 [即被擄時期]，不單過去的傳統成為了新焦點，這些事件 [被擄] 本身亦激發了重新思考的需要，並引起了新思想路線的發展，特別可見之於當時偉大的先知——以西結和第二以賽亞，並且與他們和那個時期的其他思想相呼應，就是與被擄時期後他們的繼任者——哈該、撒迦利亞、第三以賽亞及瑪拉基。⁴

事實上，由於被擄對猶大人來說是一個能與出埃及事件相提並論的集體回憶，被擄必然為他們的信仰帶來深入的反思，激發他們重新思考舊有傳統的認可性，造就了新思維的發展。就在這深刻沉痛的經歷中，希

4 “But it is not only the heritage of the past which comes into new focus at this period [i.e. exile]. The events, themselves necessitating rethinking, have provoked the development of new lines of thought, markedly in the great prophets of the time, Ezekiel and Deutero-Isaiah, and, echoing them and the other thought of the period, in their successors in the immediate post-exilic period, Haggai, Zechariah, Trito-Isaiah and Malachi.” Peter R. Ackroyd, *Exile and Restoration: A Study of Hebrew Thought of the Sixth Century B.C.* (London: Xpress Reprints, 1994), 233.

伯來聖經中重要的書卷一一面世，當然其中有着重要的神學反思，包括對被擄事件的神學詮釋，以及對被擄回歸與重建聖殿的關注，而其中一項重要的內容，便是被擄回歸的以色列人如何藉着這些書卷的寫作去探索他們自身的身份。筆者將在此書說明，這些於被擄回歸時期成書的書卷如何反映猶大人建構其身份認同。而無論在哪一卷書，猶大人身份這一課題都呈現於舊傳統與新思維之建立當中。舊傳統固然是建立身份的基石，新思維的冒起卻讓這個古老的基石得以在新的場景中更新，這些新思維不住重塑以色列人對其身份的認同。

以色列人在巴比倫的生活——貴族階層

以色列人對其身份的尋索發生於被擄到巴比倫這個有血有肉的場景中。若我們要了解他們在身份上的反思與掙扎，便必須了解他們在巴比倫所面對的生活。慶幸，我們在這方面有不少資料。除了聖經某些